

陳文鴻博士的發言稿

主席：陳文鴻博士，請陳博士。

陳文鴻博士：多謝主席，多謝各位今日來聽這個討論。我和林毅夫教授應該有很多爭論，因為從理論層次來說，我們都可說是屬於不同的派系；芝加哥新古典主義學派的經濟學講求完美，而我師承的中歐、東歐的政治經濟學，並不要求完美，而是著重對具體的過程作出分析。幸而今天不是討論中國的發展戰略，所以我們不會有多大的爭論，雖然我們在另一些問題上有爭論，但是今天是說具體情況，因為具體情況關乎事實，不能隨便改變，所以我們有很多看法是相同的，只是在分析方面有些差別。就他剛才發表的論文，我想就幾點作一些簡單的評論。

就大家很關心的人民幣貶值問題，我絕對同意林教授有關人民幣是沒有貶值的理由的說法。這裡其實有兩個問題的。很多金融界的評論員將中國的人民幣貶值與否，很簡單地祇看一個統計指標，即是說中國出口增長怎樣。事實上我們看人民幣會否貶值，不能單看出口增長數字，而是看其淨出口增長多少，因為即使其出口貨量很多，若進口量更大時，就如香港般進口貨量大於出口貨量時，一旦出現逆差，幣值便會有貶值的壓力。以中國今年的情況而言，雖說出口增長較以前下跌，但是進口量跌幅更大。所以，中國今年上半年的外貿順差達到二百多億美元，比去年還多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你熟悉國內的統計數字的話，國內企業實際上取得的外匯收入，遠比海關統計的外貿順差為大。再加上中國今年的外來投資，即使數額與去年相若，在國際排名上已經是僅次於美國。也就是說，在有龐大的外匯流入中國的情況下，我看不到人民幣有甚麼原因需要貶值。當然，有兩種人認為人民幣需要貶值。一種是投機的人，另一種認為以前人民幣貶值，所以現在也應該貶值，而不理會經濟數據，單憑報章上某人說「人民幣應該貶值」，便說會貶值。一般而言，企業的行為不會看得那麼長遠，既然相信人民幣會貶值，便作出相應的準備。

反過來說，我覺得人民幣有升值的可能。一個很簡單的理由是，中國的外貿順差，特別對美國的順差是很大的。美國現時正面臨歷史上最大的外貿逆差，而美國以前應付外貿逆差的方法是迫其他國家把貨幣升值。所以我相信美國的泡沫經濟穿破的時候，便可能需要用這個方法去挽救其經濟。基於此，我認為人民幣會有升值的壓力。

另一個是國內因素，基於政治上的需要，人民幣也可能需要貶值。理由很簡單，就是貶值會對某些人有利。假如人民幣貶值，出口的企業即使不需要作任何額外的事情，也可以立刻賺很多錢，原來虧損的也可能變成有盈利，而有盈利的企業則可以賺更多錢。所以，國內很多出口企業，特別是外經貿系統長期要求人民幣貶值。今年上半年，石油化工企業也面臨虧損，所以他們也希望人民幣貶值。所以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不再源於單一的經濟因素，而

且還有政治因素。當前的中國政府不會像過去那樣，用人民幣貶值去刺激出口，藉以推動經濟增長，反而希望較為平穩地發展經濟，免致出口過多之時，引起外國的制裁或刁難。但是，中國內部在人事、派系方面，以致某些集團基於本身利益，仍會不停地要求人民幣貶值。

我認為最近中國在出口方面，突然大幅度增加出口退稅，正好反映出這方面的壓力。事實上，中國出口貨品需繳納的稅款不多，但出口退稅率遠比出口所納的稅為多，換句話說，政府津貼了部份出口。對這些企業來說，他們無需做額外的事情而有多些收入，當然有利。從政治的角度而言，政府的決策需要考慮到不同政治勢力的平衡，所以用增加出口退稅這辦法的來抵消人民幣貶值的壓力。但我無法確知今後的經濟及政治情況，當某些出口企業、出口集團所賺的錢愈來愈少時，他們會以甚麼方法來維護自身的利益，及維護其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。所以，政治因素也構成貶值的壓力。

第二個問題。我認為八個percent (百份點)的經濟增長是一個政治指標，而不是一個經濟指標。政治指標，是指朱總理所定的政治指標。我想，他們希望有八個percent (百份點)的經濟增長，如果沒有八個percent (百份點)的話，對新上台的人的聲譽會大有影響。但是，從去年開始至今年的整體經濟政策來說，我認為他是和自己的承諾「對著幹」的。政治上，他希望取得八個percent (百份點)的經濟增長，事實上，其經濟政策卻在破壞取得八個percent (百份點)的基礎。原因很簡單，我認為朱鎔基總理的整個政策很近似

美國政府的做法，或者美國經濟所做的down sizing(縮減機構規模)。純粹從財政角度考慮，中國訂下了在三年之內或者二零零零年之時消除財政赤字的目標，所以每年都要削減財政赤字。若能削減財政赤字，中央便能再補貼企業的虧損，否則虧損的企業面臨倒閉，工人也要下崗。他們在考慮整頓企業的生產時，寧願辭退職工以騰出資金購買機器，即使工資在成本中所佔的比例不是很多，但職工比較容易辭退。再者，他們迷信機器，即使機器貴得很，或買回來是浪費的，但仍覺得是值得買的。

問題是辭退職工後，職工的收入減少了，購買力自然相應減少。在去年及前年，雖然中國的整體經濟增長不是很高，投資增長減少，生產力過盛，但消費的增長仍是很強的。在過去幾年，中國每年的消費增長都超過百分之十，但是今年則跌得很厲害。原因很簡單，他們辭退這麼多人，被解僱者的購買力減少，不買東西，消費自然減少了；未被辭退的人也憂慮早晚會失去工作。朱總理若然發起精神病來，甚至可能將全部員工辭退。在他提出的政府機構改革中，政府將在未來三年內不再撥款資助事業單位，而現時事業單位僱用達二千萬人，而這些在城市工作的人的收入又是比較高的。當然，被辭退的中央政府官員的比例相當有限，但假如延伸至地方官員也被辭退，牽涉的人數便會很大。問題是整個down sizing(縮減機構規模)實際上已經挫傷了消費，人們還憂慮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他們的收入，導致人們不敢花錢。再加上房屋、衛生醫療各方面，都可能進行市場化。而市場化意味著加價，也就是說人們現時的收入會愈來愈不足應付開支。人們開始出現信心問題，

消費力也愈加疲弱。

所以在某程度上，朱總理和日本橋本龍太郎政府的政策差不多。實施平衡財政收支的結果是，日本方面加稅，中國方面裁員，都導致消費銳減。針對消費下降的情況，兩國都想藉公共建設來振興經濟。誠如剛才林教授所說，公共建設不可能在短期內產生效果，甚至造成很多浪費，建成之後，可能馬上要虧損。所以我們可看到以下的情況：即使朱總理強迫銀行貸款，用計劃經濟的手段以推行市場經濟，結果，這幾個月經濟增長仍是不停下跌。我相信這政策若維持下去，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仍會低於百分之七；造假數則除外。

但很幸運地，中國的政策在這幾個月有很大的改變，我想down sizing(縮減機構規模)、裁員下崗等事差不多要停止了，在金融方面有很多改革已放緩，房屋改革亦然。原因當然是有部份地方官員表示反對，也有部份中央政府的官員覺得這種做法是危害整個社會的政治穩定，所以要修改。我觀察到在六月底之前的幾個月，有很大量、很清楚的政策轉變，錢借貸出去，不單是搞公共設施，還支持中小型企業及鄉鎮企業發展，正是這個原故，江澤民總書記到蘇南地區時探訪了鄉鎮企業，表示應該扶持鄉鎮企業及中小型企業的發展。

我絕對同意林教授剛才所言，中國不應只資助大型企業，反而要顧及到

中小型及勞動密集的企業，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發展趨向市場化，需求及消費在整體經濟中的地位更形重要。若要消費，人民便要有錢、有職業。企業實行down sizing(縮減機構規模)及削減工人固然有助增加盈利，從資本家的角度來說縱然是一件好事，但被削減的工人便成為政府的問題，因為政府將這班人安置，費用會很昂貴。倘若這班人未能妥善地安置，更會演變成社會動亂。

另一方面，裁員固然為企業的資本家帶來暫時的盈利，但會帶來整體消費力的減弱，需求及銷售量減少所導致的損失，將遠超過裁員的成本。結果，企業繼續虧損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。各位熟悉的二、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，在某程度上便是人為製造恐慌場面而導致長期衰退的結果。基於此，我反對香港公務員及中國公務員減薪。

我絕對同意林教授剛才所提出要支持中小型企業的發展，而我相信在未來數月，中國政策會有所轉變。繼續投資在大型企業或項目上是不行的；銀行傾向貸款給那些有錢的大型企業，問題是大型企業沒有投資的機會，於是他們便將錢存入銀行，結果不能刺激經濟增長。中小型企業面對市場疲軟、需求相對不足的局面，即使得到政府的資助，都可能會虧蝕，因為無法擴大其銷售量。針對這個問題，除非政府改變其政策，否則是不可能維持經濟增長。我相信改變會在今年底至明年初出現，因為中央政府已經提議在農村地方搞大量的水利建設，這會製造出足夠的就業機會，而這個效果將會在收成之後，

即今年年底以後才出現。

但我絕對不同意林教授所說中國應採用比較優勢的效應來發展工業。從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概念來看，中小型企業可能遠比其他大企業先進。十九世紀至今，從國際整體上的趨勢來看，企業是趨於愈來愈大，而非愈來愈小。就中國的市場競爭而言，我們將看到中小型企業、甚至鄉鎮和廣東企業在今後的發展過程中，當遭遇來自其他企業的競爭力、外資的競爭力加強的時候，他們會逐步被取締。雖然在一段時間內中小型企業數目還會是很大，但是他們會有很多虧損。在九四年之前，廣東省藉中小型企業、鄉鎮企業的發展，對全國的貿易是有順差的，而九四年之後已經變為逆差。換言之，廣東貨的銷量，不足以與其他地方企業的貨品競爭。比較成功的例子如江蘇省、浙江省，成功之道不是靠價廉，反而是他們的職工的文化及教育基礎比較高。以廣東省為例，我們中心曾做關於廣東省民工的調查，發現從北方、四川來的民工的教育水平比廣東省本地的管工還要高。那些教育水平低的管工使用勞役、野蠻、資本主義的方法去管理這些民工所得出來的效果是，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，便沒有問題，若有競爭，便被比下去了。

我們也曾經調查過他們的投資策略，譬如說廣東鞋廠引進意大利的設備及皮革，抄襲意大利的款式而生產出來的鞋款質量比意大利所製造的要差，價錢卻比意大利製造的昂貴。結論就是，單純依靠這些中小型企業的勞動力，而沒有提高技術及考慮市場上的需求，結果註定失敗。所以，我覺得自由主

義在這方面可能是錯誤的，以歐洲為例，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國際上著名牌子的服裝，多是在意大利鄉村的小廠生產，每間廠可能只有二、三十個員工，設備不太完善，投資也不很多，但是所生產的貨品質量很高。關鍵每間廠之間能互相協調，地方政府又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事實上，整個歐洲現時發展的重點是地區性發展，是由政府帶動一些中小型企業互相結合、互相協助，然後提高其技術水平。

臺灣的中小型企業也如是，雖然政府在經濟上沒有特殊支援性措施，銀行亦不向其貸款，因為當地沒有民營的銀行，而是靠地下錢莊，但是他們之間彼此協調得很好。臺灣的生產力促進中心的宗旨跟香港的不同，不搞高科技，而真是協助企業發展業務，於是臺灣能夠將很多同類型的小型企業集合起來，透過建立規模經濟，再加上政府的介入，外界訊息的提供，以提升其效率。單靠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，或是中小型企業的個別發展，我想最後將會像廣東省的中小型企業那樣陷於失敗的境地。總結這一點，我們可以看到，中國發展可能需要投資大型企業，也需要搞小型企業，但發展的方法不再是計劃經濟時候的那一套，對整個大型企業、小企業的發展是需要政府的投入；提供教育及訊息等。

問題是在改革以來教育方面的發展停滯不前，我想可能是鄧小平先生的因素。孫尚清先生曾經說過，「鄧小平先生提議有錢才搞教育，沒有錢不要搞教育。」但其實剛剛相反，國家發展能否提昇是靠教育超前的發展，才可

以帶動經濟發展。中國在改革以來，教育是倒退的，特別是農村的教育。所以我覺得中國即使在過去這十幾年出現了奇蹟，誠如林毅夫先生的文章所說，今後面對的問題要比以前更為嚴峻」。

問題嚴峻不等如我們沒有能力加以克服。舉例來說，中國家用電器、彩電之類已經打跨了日本進口的牌子了，所以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崩潰，是因為在中國發展市場失敗了。中國的成功企業不一定是小型企業，譬如剛才所說長虹是軍隊所辦的，很多的企業都是從一個劇烈競爭中發展出來的，嚴格來說，其技術水平不差於任何國家。在國內售賣的廿九吋彩色電視機，價錢不超過三千元人民幣，試問在那裡可以買到如此便宜的電視機呢？若果給予中國的企業一段時間，透過現時的市場環境，他們是有前途的。但若要取得更佳的效果，最有效的方法除了是長遠而言改善教育外，更要利用現代的訊息及電訊。電訊業的開放對中國的企業是很重要的，我想中央政府已進行開放，但現在所採用的方法基本上是，有關經營方式表面上都被視為犯法而實際上並不犯法，所以情況很混亂。我認為整個體制的變化已開始，有識之士正在進行這方面的改革，我相信很快會見到成果。

問題轉到怎樣利用中國的經濟效益來改善香港的前途。我覺得香港現時的經濟模式是沒有前景的，理由是香港以服務業為主，主要靠珠江三角洲的製造業，而珠江三角洲的製造業有部份做得不錯，但有部份則只用民工的生產方法，技術上沒有提高，甚至下跌了。廣東省沒有競爭能力，再加上美國

主動地將東南亞的貨品轉移到拉丁美洲進口，於是由於產地來源配額方面的改變，我們利用珠江三角洲就減少了。當香港在內地的製造業不能夠提昇或改善競爭效果的時候，本地服務業是無以為生的。金融業、公司上市等方法，最多可能僱用十萬餘人，香港其餘六百多萬人，可能一半要離開。香港怎樣利用國內來發展經濟呢？我暫時想不到有甚麼方法。再搞民工式生產方式？沒有前途；從事房地產亦沒有前途，因為國內和香港房地產的市場截然不同，不可以在短期掀起炒賣熱潮。

我覺得林教授所提及的發展內地人到香港的旅遊業也不甚重要，因為所佔比例太小了。反而長遠來說，利用國內人才可能是好事，但我不知道怎樣去利用。即如珠江三角洲的香港企業般，民工的教育水平高於管理層，他們怎善用人才呢？我相信香港人的教育水平不會比國內的精英份子為高，甚至是更低，於是怎能利用一些好的人才呢？譬如說買國內的企業，幫國內的企業上市、改造，我擔心正如剛才所提及的金融方面，作用很小，而且香港又沒有這些人才。現在香港的金融機構不能夠培養這方面的人才，人才都是依賴國內的人到美國學成歸來。由此可見，香港有很嚴重的問題，便是整個教育制度和整個社會、地區的需要非常脫節。我們可以在美國、英國學府的期刊發表很多論文，但是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未能在今後的情況下找到工作，卻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。就香港整體社會來說，即使今天的環境尚好，但是整個社會是不瞭解國內，所以我不相信香港的人才可以幫助改造國內的企業。

再多舉一個例子，我們在調查過程中發現，國內有一間公司在國外上市，而不是在香港上市的，其中有一個資產項目，是在國內的一間工廠。據我們調查所得，國內的公司從來未曾給這間母公司任何financial statements(財政報告)，但這間母公司上市交易已很多年了。於是要瞭解其情況不是說將我們的標準置於國內，而是入鄉隨俗去瞭解情況，不能光說他的方法不行，我們按照自己的方法寫出來便算了，你要真實地如實反映出來，及真正瞭解其情況。以香港來說，我覺得無論是大專學界或企業界，對內地情況的瞭解都很有限。在珠江三角洲賺錢很多，並不等如你就瞭解國營企業或者北方的情況，所以在這方面，即使一國兩制，我希望香港與國內仍有溝通。

我和林教授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別，就是我對香港前景是悲觀的。我看不到香港能夠怎樣利用中國今後的好處來幫助我們自己的發展。可能出路就是香港人返回國內居住；報紙亦有刊登，在香港做乞丐，返到國內可以做皇帝。可能這樣對香港某些人有好處，但能否維持香港未來的整體經濟、一個擁有八百萬人口的經濟，我是抱 很大的疑問。多謝各位。